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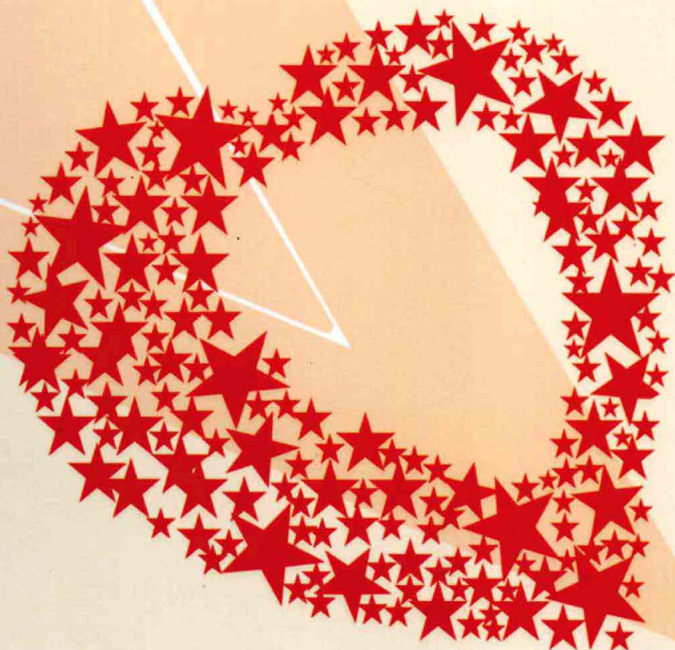
汶川

WENCHUAN KANGZHEN JIUZAI YIRI

抗震救灾一日

下

总政治部宣传部



解放军出版社

汶川

WENCHUAN KANGZHEN JIUZAI YIRI ZHENGWENXUAN

抗震救灾一日

(征文选) 下

总政治部宣传部

成都

汶川·抗震救灾一日

(征文选)下

解放军出版社

女儿心,芳草心

辛 茹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女兵的故事。她叫张颖琳,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部驻二炮记者站的记者。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个女兵,这个女记者,这个女儿只有两岁的年轻母亲,她不仅亲身经历了汶川大地震,而且在她主动参与的抗震救灾中,独自在上千人的男人堆里,苦苦泡了60多个日日夜夜。

张颖琳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女孩。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第一次见到她,当时就觉得她青春靓丽,光彩照人,而且颇有品位,这让我感到她更应该生活在时尚圈里,而不该做白天到处乱窜、晚上点灯熬油的记者,更不该做裹在一身迷彩服里的军事记者。这种印象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就在央视七套的“特别关注”栏目里再次见到了她,但与初识的感觉大相径庭。在那档主要面对军人的访谈节目里,她很端庄,很沉稳,也很理性,而且还很有军事类节目主持人的那种大义凛然。这让我一时弄不清她到底是不是那个曾和我有过一面之缘的时尚女孩;这种感觉还没有巩固,我在2005年二炮宣传部组织的新春茶话会上又一次与她相遇,这时她变成了一个举止朴素的邻家少妇。我记得她那天穿着一件宽宽大大的白色羊绒衫,高高地挺起腹部,让人一眼望去就知道她要做妈妈了。虽然她像所有怀孕后期的女人一样看上去有些臃肿,有些疲倦,但我觉得她依然漂亮,依然不减过去那份从容,只是这种漂亮和从容更亲切,更平易近人,也更脚踏实地。就这样几次见面,几次换个模样,我感到她就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让人目不暇接。

一个月前,我和著名女作家顾保孜一起去灾区采访,刚走到二炮技术

总队前线指挥部的帐篷前,远远就看见她笑咪咪地跑了过来,几乎晒伤的肤色和在双臂上浮起的那些斑斑点点的肿块、疤痕,让我们一下子就看出她已在灾区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打了。我们不由自主地和她拥抱,又把她拉进我们的帐篷,三个女人就此一见如故地聊着、笑着,全然不知接我们过来的干事在什么时候已悄然离开。也许是早得知我们要来灾区采访,她如数家珍地向我们讲述二炮技术总队的救灾过程和细节,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在去部队临时食堂的路上,顾保孜像搂着女儿那样搂着她的肩头说:“丫头,你就是我们在灾区采访的路线图了。”

当天晚上,因为我们和她的帐篷比邻而居,她打电话的声音便很清晰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听出她是在和她两岁的女儿通话,她说乖乖,明天是姥姥的生日,你要替妈妈好好地亲亲姥姥,祝姥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她跟电话那边的女儿互相“腻”了好长一段时间,让我隔着墙壁也知道她的脸上是什么表情。

当时我就在心里想,这个“陀螺”到底还要怎样旋转下去?到底还有多少个面?但随着我们在灾区的接触渐渐地多起来,又随着我们互相间的交流不断深入,我逐渐看见了她最真实又最愿意保持的一面,看见了她深藏着的那颗柔软的女儿心。她曾经让我感到眼花缭乱,原来是她内心柔肠百转的一种外化,或者说是一种爱的辐射和延伸。因为这是个充满柔情和爱意的的女人,她爱生活,爱亲人,爱朋友,同时也狂热地爱着她的职业,爱着我们这个国家和她所有的幸福和不幸的人们。张颖琳不愿多说她在成都亲身遭遇地震的那段经历,但作为一直坚守在灾区的军事记者,她非常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战友是如何帮助一座座破碎的城市和村庄复苏的,如何帮助受灾同胞重树生活的信心,走出灾难的阴影。“说实话,我现在很不愿提及任何关于‘5·12’那天的情况,”在绵竹地震灾区的部队帐篷里,张颖琳对我们说着说着,忽然脸一沉,她说:“因为那样我会从心底往外痛:为那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四川人痛,为那些过早离开我们的孩子痛,为我们那么辛苦付出的战友痛,也为我两个月来对小女儿的思念痛。”

但面对两位早已熟悉的大姐,张颖琳还是忍着痛疼,对我们说起了地震那天她在成都的遭遇。虽然我们也于心不忍,但还是渴望听到她的诉说。

张颖琳告诉我们,今年5月,她恰巧带着父母和孩子到成都休假,这是她在中央电视台驻二炮记者站工作8年来的第一次休假。5月12日14点28分

地震发生时,她们正在成都的佛教寺院文殊院游览。她说,当时,她也许是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年幼的女儿身上,因而并没有特别感觉到大地的颤动,只是看到女儿在通往大殿的石阶梯上来回地摇晃,也就是几秒钟吧,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地震,那一瞬间她拼命地奔向女儿,一下子把女儿夹在腋下,同时拽着愣怔中的父母,本能地冲向空旷的地方。地震大概持续了10几分钟,文殊院一座座殿堂同时发出一种相互挤撞的声音,屋顶上的瓦片稀哩哗啦地往下砸,游客们惊恐地躲闪着,喊叫着,现场一片混乱。刚刚感到脚下平静了一些,她对父母说:“快跑,要尽快离开这儿,到马路中间去。”她抱着女儿,让父母紧跟在身后,慌忙奔跑着穿过文殊院南门前狭窄的街道,把一家人勉强转移到宽敞的马路中央。直到这时,她才感到一阵惊讶,感到像她这样的一个女子,在刚才竟然能跑得那么快,那么有力量,这真有点神奇。到了马路中间,她看着四周的高楼,在心里紧张地盘算着下一步行动。“我想,如果这些楼房在余震中倒塌,我们所站立的位置是不是安全的?我抱着惊恐的孩子,安慰着不知所措的父母,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对她们是多么重要。”她说。

后来,拥挤到他们站着的那片空地上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是摩肩擦背了。由于不断有余震袭来,移动电话又打不通,人们的恐慌情绪在持续升级,各种议论和猜测使得混乱的局面更加混乱。3个多小时后,人群才渐渐散开。

接下来的一天,张颖琳抱着孩子,带着父母,每天到公园里去躲避余震。“你不能想象那时候的成都有多么的惶恐,”她说:“那时只要是空旷的地方,无不人头攒动。到了晚上,我们就回到家里,把女儿的积木一层一层搭起来,用来观察是否有余震。我还在卫生间的浴缸里放了矿泉水、食品和棉垫,以防万一。”最难熬的是5月12日那个夜晚,张颖琳几乎彻夜未眠,随时准备把老人和孩子从睡梦中叫醒,随时准备带着他们夺路而逃。再后来,为缓解家人心理上的恐慌,她也像很多成都人一样,自己动手在路边搭起了帐篷,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老少四口安置在那个又小又简陋的帐篷里。天真的女儿还觉得妈妈要带着他们去路边野餐,跑进跑出的,开心得不得了。她为女儿还不知道这是一场悲惨的灾难而感到欣慰,更为父母和孩子如何度过未来的日子而感到焦虑。“只要是离开帐篷一小会儿,回来时一准看到父母关切的目光。”张颖琳说,自打亲身经历了地震,她才知道亲情是那么

的温暖。她甚至没有想到避讳：“在我们为那么多从此阴阳相隔的人们流泪的时候，我暗自庆幸我的家人都坐在我的身边。”

地震过后，张颖琳马上想方设法与单位联系，成都的通讯联络一恢复正常，她的手机就二十四小时都开着，时刻听从部队的召唤。她说，作为军人，她知道在这样的大灾面前，我们的部队一定会像年初抗击冰雪一样，随时赶往一线。5月14日，二炮部队开始挺进汶川，她知道自己该出发了。5月15日，她含泪告别了还住在路边帐篷里的家人和孩子，一路往西到达绵竹，和在那里救灾的技术总队会合，负责那个方向的新闻报道。从此，她成了1000多名官兵中唯一的一名女性。她和官兵们住一样的帐篷，吃一样的干粮和方便面。官兵们身上有多少汗水，她的身上也有多少汗水。

“现在想想，在灾区采编的每一条新闻，每一集专访，每一篇稿件，都表达着我对我们这支部队官兵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爱戴。”张颖琳说：“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始终被他们感动着。我记得在无路可走的大山里，战友们冒着余震、滚石，手脚并用地艰难行进，终于深入到大山腹地，营救出那些孤苦伶仃的被困老人；我记得在重建河兴新村的三天四夜里，有的战士真的是一刻也没有休息，有的战士吃着吃着方便面就睡着了，就为让还住在路边的老百姓早日住进板房；东北镇有1500多人挤在一个大窝棚下，生活环境极其艰难，又是我们的官兵在一夜之间让这个窝棚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当某警防营营长指挥他的官兵们为灾区防疫忙碌的时候，他的母亲、孩子却在与病魔斗争；当同在二炮部队任职却两年未曾见面的父子，在灾区隔着抗震一线的会议桌相见时，也只是匆匆地点了点头，会后又各自奔赴救灾现场；特别感动我的是，当我们总医院的医护人员为一个聋哑儿治疗后，那个孩子用凄厉而古怪的声音唱起那首《感恩的心》，让所有在场的人的心都碎了……我亲历了这一切，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切，它们所传递出来的人性的光芒，将让我终身难以忘怀。”

“应该说，在进入军营的10年间，我经历了一些大的事件，也参加过一些大型演习，但是像这次抗震救灾的一线报道，我还是第一次碰上。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次经受生与死的考验、第一次在60个日日夜夜和1000多个男性战友并肩战斗在抗灾一线……在灾区住过的那个小帐篷，我已经带回了北京，因为它承载着我许多在特定时期的记忆。比如，在那段时间，当我在某一天打开帐篷的拉链时，我会发现在帐篷门口放着不知是哪位战友送来

的晾衣架；再比如，当中午帐篷内的温度升至40多度时，又不知是谁悄悄地在我的帐篷门口放下了几块西瓜、几片解暑的药片……那些天大家都晒黑了，脸上都疲惫不堪，但是战友之间的情感和友谊，却像芳草和清泉那样不断地涌出来，而且这种情感的芳草和清泉是这样的纯净，这样的甜美，这样的沁人心脾。”

我记得张颖琳在说着这些的时候，长睫毛下的两只黑黑的眼睛里始终盈满泪水。当她讲完她自己的故事和她在灾区的所见所闻，我们久久无话，没有谁想打破这寂静。

是啊，我当时在心里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亲情，比友情，还有我们特有的战友之情，更纯洁，更珍贵呢？谁不愿意永远啜饮这情感的芳草和清泉呢？

我再次见到张颖琳，是在7月30日晚上。当时我们都已回到北京。那天，张颖琳打来电话说，要来我家里给我送一盘凤凰卫视录制的“潍柴凤凰大视野”，那是凤凰卫视已播出的介绍二炮技术总队抗震救灾事迹的一个电视专辑。而做成这个节目，当然与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电话里我试着向张颖琳提出了一个要求，我问她方不方便把她女儿也带过来，让我见见。她痛快地答应了。这个名叫“薇儿”的小姑娘，那副灵动和皮肤能滴出水来的小模样，真是招人喜爱。在我家呆的那段时间里，我试着和她接近了几次，她却不大理会，一直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眼睛专注地看着她妈妈。张颖琳歉意地说：“这孩子是属于那种慢热型的，等她和你熟了，话多着呢。”送她们下楼时，我问小薇儿，让阿姨抱着你下去好不好？她矜持地点点头。我抱着她下楼的时候又问她：薇儿，在电视里看见过妈妈吗？这回她使劲地点头，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我又问她，看见妈妈在电视里干什么呢？她说，看见妈妈哭了。我问她，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哭？她说：“妈妈说她没有办法去救小朋友，她很惭愧。”那一刻，我很认真地对薇儿说：“噢，你妈妈说的不对，她的工作也很重要啊，她和叔叔阿姨们已经为灾区的小朋友建了好几所学校了，那些孩子有地方住，有书读，才会忘记灾难，才能快乐地成长呀。”我正在为自己对一个两岁多的孩子说这些话而感到很不靠谱时，没想到小姑娘一本正经地说：“我也这么认为。”我略微一怔，继而放声大笑。张颖琳说：“人小鬼大，她也经常这么吓我，用的词准确着呢。”

看着薇儿小小的身影在夜色里回过头向我招手，我终于明白张颖琳在

地震灾区为什么每次说到女儿,无论当着什么人,都会动容落泪。我想,对一个扔下两岁多的女儿赶赴灾区的年轻母亲来说,在那漫长的60个日日夜夜,她该是多么地想念这个可爱的小人儿啊!

回到家里,我给颖琳发去一条短信:“你真棒,女儿真棒!好好开车,不必回复。”

(作者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

医疗队员何勇和罗旭

曹 岩

在我眼里,心外科主治医师何勇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大男孩。白净的皮肤,线条柔和的脸,大眼睛,双眼皮,睫毛很长,说话的时候在眼镜后面忽闪着,让你禁不住想,要是这样的睫毛长在一个女孩子的脸上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当然,这并不是说何勇有些女孩子气,不是的。他就是一个大男孩的样子,是那种干干净净,性格开朗,很热心的大男孩。

吃过午饭,何勇把妻子写给他的一封信拿给我看,要给我作创作素材。信是打印的,想必是通过电子邮件发过来的。读着读着,一个娇小柔弱的妻子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

老公,你已经走了整整一周了。今晚电视台预报可能会发生六至七级强余震,周围的邻居都迅速离开了我们居住的高楼,看着在床上已经熟睡的女儿,我突然特别地想你。老公,你要是在我身边该多好呀!

11时30分,突然收到你发来的短信,我好高兴,“没有和你们在一起渡过难关,很对不起你们!只有靠你们自己克服困难了”。在家里,你总是像棵大树支撑着我们的小家,总是我和女儿的依靠。地震当天,当我在恐惧中跑出我们的大楼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给你打电话,可是一直接不通。后来才知道你当时还在13楼坚持给病人做手术,并且马上将作为第一批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奔赴灾区。的确,你这一走,就只能靠我自己了。

快速地翻箱倒柜找出你以前买的野营用的帐篷,无奈地弄醒

了睡梦中的女儿，为了安全我准备带她去红楼宾馆的草坪上过夜，那是我所能想到的较近的一块安全的地方了。女儿揉着惺忪的睡眼，没有哭闹。自从知道你赶赴灾区抗震救灾后，女儿就好像懂事了許多，在幼儿园给灾区捐了200元钱，她知道这能买两个芭比娃娃，还自豪地告诉老师和同学“我爸爸地震那天就到灾区救人去了，他是解放军、医生，还是医疗队队员，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爸爸的名字了。”女儿迷迷糊糊地跟着我来到小区门口，打不到的士，我只好牵一段、背一段、抱一段，带着她到红楼宾馆的草坪上。

小小的帐篷，要支起来还真不容易。越弄不好，我愈发紧张，一方面担心余震的袭来，另一方面又担心女儿在野外感冒会加重。看到别人都是夫妻带着孩子，心里好羡慕。要是你在该多好啊！这时，旁边的好心人主动来帮我弄好了帐篷，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好像在灾难的时刻，大家都特别能团结互助。

女儿快要睡着了，头有些烫，呓语着：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是呀，老公，你什么时候能回来？长期不能定时吃饭使你的胃不太好，你能不能吃到热饭呀，有没有犯胃痛，余震时能不能撤到安全地带呀……天边渐渐地露出了微曦，你又发来了短信关心我和女儿的安危，原来你刚刚为一名搜救战士做完手术，一夜未眠……

我不禁泪流满面，有心痛也有感动。老公，你安心救治伤员吧，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会照顾好女儿照顾好自己。与在大地震中丧失亲人、丧失健全身体的无数同胞相比，我们所面临的这点困难又算什么呢？作为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首批医疗救援队队员，你是成员中唯一一名非高级职称的队员，这说明组织对你的认可，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努力工作，在灾区拯救更多的生命！我和女儿相信你是好样的，我们为你骄傲，我们等待你凯旋归来！

妻子童玲

何勇还把他记在手机上的两条日记，转到我的手机上，内容正是那一晚上的情况。

5月19日晚,空气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有预报今夜余震可达6至7级,所有的病人都撤出了楼房,手术室也关闭了,空地上聚满了伤病员。11时,大坪医院第一支抗震救灾医疗队收到了院所党委送来的党旗、院报、抗震救灾简报和慰问信。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程晓彬书记立即组织大家召开了支部全体党员大会。在夜色中,在国旗下,宣读了校党委和院所党委致全体队员和家属的慰问信,传看了简报和院报,感受着上级对我们及家属的关注和爱护,全体党员深受鼓舞。我们在国旗下宣誓,决心牢记宗旨,不辱使命,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决不辜负院所党委对我们的期望!

凌晨时分,救护车从灾区绵竹送来了一名孕妇,已经破水,必须马上剖腹产。情况紧急,赵先柱副校长决定立即展开野战手术车,开展手术。凌晨3时25分,我野战手术车上传出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划破了夜空中的阴霾,守候在手术车外的亲属和志愿者兴奋地鼓起了掌,年轻的父亲喜极而泣,周围帐篷里避震的人都围拢过来看望新生命。3050克的一名健康男婴,它的诞生似乎在诉说着众人对生的渴望。生命的顽强,鼓励着灾区不幸而又幸运生存下来的人们克服困难,顽强勇敢地生活下去!

我的眼睛里不知不觉地充满了泪水。这就是我的战友,我的军队和我的同胞,在灾区采访的日日夜夜,我常常被这样的战友和同胞感动得泪流满面。回北京后,我把何勇妻子的信,和他自己写的一篇短文一起,一字一字地打成电子版,请正在编辑《汶川抗震30天——总后抗震救灾文艺作品集》的同事收入书中,很多人看了都受感动。

下午的时候,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德阳医疗队总指挥赵先柱将带领几名队员于当晚回撤学校,执行新的任务。

奉命回撤的队员名单一直没有公布,大家互相打听,心里像长了草似的躁动不安,但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连我都感到了人群中的那份惶惶和急切。

已经12天,他们离开家已经整整12天了。况且那是怎样的12天,他们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离开家的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那个名单里有自

己。可是他们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让那份期盼流露出来。

其实名单上的队员早已分别接到通知,但是出于善意而缄口不言。可是晚饭后就要出发了,终归是要收拾行囊的,终于知道有谁要走了。要走的人谁也没有表现出欣喜或兴奋,因为他们不忍心。而留下的人,也在掩饰内心深处那份不可避免的失落和忧伤,尽力地表现着坚强。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罗旭。就是那个每天早上准时用一声“断喝”,挨个帐篷叫大家起床的人——罗旭。

其实一到德阳,我的视野就不停地晃进一个戴着一副深色眼镜,皮肤黝黑,肩牌上扛着“一毛二”、浑身充满活力的小中尉。因为他老是背着一个看上去很有点专业的照相机,脚下很有弹性的忙来忙去,我一直以为他是某个附属医院随队工作的摄影干事。而且在所有需要照相的时候——比如校领导来慰问啊,友邻医疗队来走访啊,和德阳医院互赠纪念品之类的事,他都很自然地充当着摄影师的角色,而且从来也没有人想过要把他也拉进被摄影的队列里。直到有一天给大家照完相,他自己抱怨起来:“我老是给别人照,从来也没人给我照,其实我也不是专门干这个的!”我这才开始关注他。

中尉罗旭今年23岁,是第三军医大学所有抗震救灾医疗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名干部。是医大刚刚毕业的一名本科生。在花名册里,他的名字归类在保障人员中,工作是医疗业务的上传下达,以及与医疗有关的一应勤务。

罗旭不在回撤人员名单里,但他却是最早知道那份名单的人之一,因为那份名单就在他的口袋里,确切地说那份名单就是由他负责通知的。

晚饭的时候,他情绪低落,整个人都打不起精神来,和先前判若两人。晚饭吃的是饺子,他拨拉着纸餐盒的饺子自言自语地说:“我今天吃不下,我心情不好!”大家看了看他,都没有说话。其实大家心情都不太好。

过了一会儿,他看着纸餐盒里被他掐碎的饺子说:“5个饺子被我吃成6个了。”

有人问他:“你怎么了?”他说:“他们要走,我心情不好,大家在一起这么久了……”

泌尿外科副教授李龙坤说:“等回去再聚嘛!你来召集!”

他说:“你们都是大教授,回去了你们谁还认识我?”

李龙坤说:“哪里呀!”

我禁不住问：“想家了吧？”

大家说：“早就想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有人说：“他是想多多了！”罗旭叹了口气说：“等我回去，他肯定长到40斤了。”

我一时有点晕，莫非这个“一毛二”已经结婚了？我试探着问：“多多是你的孩子吗？”大家轰地笑了：“他哪有孩子啊，多多是他的狗！”

我也笑了，我说嘛！我问他，你出来了狗怎么办？他说让朋友帮带着。然后就开始兴致勃勃地说起他的狗来。他说他的狗跟他好亲的，每天下班一进门就站起来抱着他跟他亲半天。我问他结婚了吗？大家又笑了，嘻嘻哈哈地说，他要结婚了还能抱着狗亲吗？他毫不理会，还是一个劲地说他的狗。他说在家里他的狗一刻都不想离开他。他看电视，他的狗就趴在他边上跟他一起看。他吃饭，他的狗就趴在桌子边跟他一起吃。他上网，他的狗就趴在他的肩膀上看着他上网……

见没有人应和，他有些失落地说：不养狗的人根本不懂这些！

我问他养的是什麼狗，他说斑点。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那部叫《101只斑点狗》的电影来。我说那是很好的品种啊。他就有点高兴了，说现在已经38斤了。随即打量了一下挨着他坐的人得意地说，能一下子把你扑倒！众人皆笑。

他说等这条狗老了，他要换个品种养。我问他换什么？他说黑背。德国黑背？那是一种体型很大、身手矫健、充满活力的牧羊犬，是世界首选的警犬品种啊！他的脸上有了一种踌躇满志的神情。

大家就又跟他开玩笑，说下次再出来救灾就把你的多多带来，让他给我们站岗吧！那起初的离愁别绪，似乎就在大家的笑声中销声匿迹了。

晚饭后，大家唱着“送战友踏征程”的歌，送走了赵先柱和几名队员，一切归于平静。

第二天清晨，罗旭又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叫大家起床了，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天晚上，医疗队教导员姚家文告诉我，根据罗旭在德阳的表现，医疗队准备为他请功。

（作者为总后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

军需助理员蒙国学

曹 岩

我在德阳的采访已接近尾声。按计划,我将在5月25日早上离开德阳去汶川映秀。这时候,在我的采访名单上,还剩下最后一个没有采访的人,那就是负责德阳医疗队后勤保障的医大校务部财务军需处助理员蒙国学。

本来约好晚饭后要采访蒙国学的,就因为我说了一句:蒙助理,德阳这能不能买到录音磁带?他说:好像不行,我问问吧。然后他就失踪了。

当时他正在给队员们分发慰问品。他一边忙着一边招呼着:你们几个人?这两件搬走。你们呢,几个人?这个是你们的。慰问品有印着抗震救灾纪念字样的短袖T恤,有沙琪玛、八宝粥和一些其他的東西。

分发就在我住的那顶帐篷里进行,那一阵好不热闹,我正在整理采访记录,就转移到帐篷外的塑料连椅上,边工作边看他沙哑着嗓子忙碌。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不见了,直到快九点了我都没再看到他。

我开始还耐心地等,后来我开始找他,可问谁都不知道他去哪了。无奈,利用这个时间,我去找姚家文教导员补充了些情况,又去听了会儿西南医院的党小组会。

已经快九点半了,蒙国学还是没有出现。当我再次回到帐篷里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说话的声音很像他,我忙冲出去看,果真是他!他正跟一个地方上的人说着什么。

我说蒙助理,你到哪去了,我到处找你!

他转过身很无辜地看着我说:我去给你找磁带去了……

啊?!

他说,我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卖磁带的地方都下班了。

我很歉疚,我说找不到就算了,不用找了。

他说我还在想办法,他指着那个地方上的人说,他正在帮你找呢。

他介绍说那人是德阳第一人民医院管后勤的干部。那人边打电话边问我是什么样的磁带,我告诉他是老式的卡带,他听了有点困惑,我就去拿我的录音机取出带子来让他看,他看了就跟电话里的人说:就是以前我们听歌的那种磁带!对方说可以找到,但要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才能拿到,因为市场开门比较晚。

那肯定是来不及了,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要出发去映秀了。

蒙国学说,要不我今晚去成都找吧!

我说绝对不行!我自己想办法,你别管了。

我怎么能忍心让一个一天睡不了四个小时觉的人跑这么远的路去给我买磁带呢?

他说,德阳买不着,你到映秀更买不着了,你能有啥办法?

我说没事,你别管了,我省着点用,实在不行就用录音笔了。其实我还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录音笔,只是我一直不太会操作,害怕出现误差,就没怎么敢用。

他说我再想想办法。我怕他真的会去成都,就说,那你绝对不许去成都!

他说,我不去。

我一直从门那盯着他,看着他转来转去的在外面打着手机,生怕他一转身就去了成都。

终于,可以开始对他的采访了。这时我才发现,他其实很不善于言语表达,被我逼着才说了二十分钟,这还要加上他想的时间。

看着他布满血丝像兔子一样发红的眼睛,我默然了。

34岁的蒙国学是武汉军事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三医大全校的军粮保障和餐饮工作都归口在他那儿。用他自己的话说:财务军需处管吃饭的就我一个助理员。

5月12日晚上,当蒙国学把一批盒饭送到学校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时候,领导说:你去吧,回家拿个衣服,跟医疗队去吧!他就跟着赵先柱的医疗队到了德阳。一到德阳,他第一件事就是找了辆两块钱起步的人力三轮车,跑遍德阳的大街小巷,一家一家敲开商店的门为大家寻购生活用品。

可以说,医疗队在德阳的全部日常生活,都是蒙国学“协调”来的。

因为他的协调,医疗队的伙食日新月异:第一天一桌十来个人吃饭只有四碗菜,第二天就增加到六碗菜,第三天干脆全体搬进了医院食堂的小餐厅,改吃自助餐了。因为他的协调,医疗队由开始的两个小帐篷、住地铺和超窄的陪护床,变成了两大两小四个帐篷,全体人员都住上了可折叠的小铁床。

他差不多每天都在跟人协调各种事情。

比如说,总部首长要到一线来指导抗震救灾,医疗队想买一个录音机把首长的讲话录下来。蒙国学跑了好多地方都没买到。这时他想起几天前,从医大转业的一个干部来看过医疗队领导,他记得这人是德阳市政府接待处的一个副处长。他找领导要了一个电话号码就跑到市政府去找人家了。于是“协调了一下,”人家就给他借了一个录音机。

比如说,医疗队需要2个U盘存资料。这在平时是很简单的事情,蒙国学出去跑了半天却买不到。因为德阳市的电脑城集中在地下,地震以后,电脑城一直没有开门营业。回到医院,他通过医院后勤部门找到医院设备科,设备科又找到他们熟悉的供货商,供货商再去找他们熟悉的做电脑生意的朋友,最后终于买到了2个U盘。

蒙国学说:干后勤的人眼里要有活。刚到德阳时,医疗队的专家教授喝不到开水,每天只能喝矿泉水。他很心疼,就跑去找医院的总务科,给医疗队协调来了一个饮水机。

那时候,医院里住着好几千人,他觉得医疗队的东西都放在帐篷里,不安全。就又去跟医院协调了一下,在不能住人的大楼里要来一间房,专门堆放医疗队的东西。

因为他找成都军区协调了一下,成都军区跟驻德阳的加油站协调了一下,医疗队的车辆就可以在德阳先加油,后结账了。

在蒙国学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协调”。

除了后勤保障以外,他还担负着医疗队驻地的安全值班任务。每到夜深人静,大家都进入梦乡的时候,他就背着他那装着全队人伙食费的宝贝挎包到处转悠,为大家站岗值夜。自从到达德阳以后,他每天最多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终日不停地跑来跑去,不知道要走多少路。

头三天因为睡觉的地方不够,他都是在汽车上坐着睡觉的,结果有一